

看物“近大远小”，看人“近小远大”。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更觉其可贵。周汝昌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的为人处世以及红学观点和诗词、书法等，在他去世后，还常被学术界文化界提及。清明时节，我又回想起与这位前辈乡贤交往的旧事……

与周汝昌先生相识，缘于编写一部辞典时涉及他的词条。早已功成名就的周汝昌，本不需凭辞典收录的词条再去宣传，但我还是去信征询其意见。喜出望外的是，他很快回了信。信中对那部辞典涉及他的词条进行了认真辨析，并提出了中肯建议。回信中说：“我的生日是1918年4月14日（阴历三月初四），辞典编辑写成1981年，这样今年我才8岁（指与我通信的1989年）。”周公的这种幽默一直伴随着与我的交往，如天津师范大学当年有南北两个校区，他给我的信有时辗转两个校区之间，我因此收到信会延迟，他就写信给在津的原燕京大学老同学石建国：“建忠是否放假了？总‘抓’不住他，乞兄代我‘抓’一次。”幽默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这种性格可能受到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俗文化的影响，因为生活本身就多有沉重，乐观面对才是积极入世，而幽默可以消解生活中的烦恼。

周先生性格中还保留着一份童真，一次我托朋友转赠给他一件小玉佩，不久北京北普陀影视城举办“周汝昌八十寿诞暨从事红学五十周年纪念”学术活动，周先生携玉佩到会场合不时用手摩挲，高兴得像个孩子。他第一次回信中称我为“贤乡契”，虽尚未见面，却让我有种亲切感，于是约时间去位于北京红庙他的寓所拜访。

让我想不到的是，享誉全国的大学者的生活环境，是未装修的水泥地面，家具也很破旧，简陋书房里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赵建忠



了全部的空间。知道我来自他的家乡天津，他就用京腔里夹杂的未改乡音与我交流，所谈多是天津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在我心目中，这位老人固然可敬，但更多的是可亲可爱。周先生的深情地回忆起红学起步阶段与天津不解之缘，其处女作《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就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初次见面，我本想多请教些红学问题，谁知周先生却说他从从事红学研究“不够格”，充其量只是个“三流红学家”，而红学应由陈寅恪那样学殖深厚的大学者去探究，才会有进境。他认为文、史、哲三者相得益彰的品质，是红学的真谛所在。这话也并非他心血来潮随口说出，而是他长期深入的思考。后来周先生写成文章《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发表在1995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为红学大家，每次见面，周先生从不表白自己近期又出版了什么专著，提出了什么“石破天惊”的

新观点等。其实即使他不表白，业内研究者也早知道并关注着他的研究动态。反观有些“专家”，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刻意卖弄，无非是表白自己“有学问”，就显得小家子气，如摆地摊似的将什么都摆出来，此举绝非“良贾深藏”的大家所为。

尽管周汝昌先生谦逊地说他从从事红学研究“不够格”，自称只是“三流红学家”，但却无人能否定其在现代红学史上的重大贡献。胡适虽根据清代文献史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但仅提供了作者的身世轮廓，同时他又认为“《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俞平伯在红学史上虽有贡献，但也曾错误地判断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鲁迅曾高度评价《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但仅是谈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变迁时笼统提及，当时《红楼梦》在国人的心目中远未达到现今“四大名著之首”的崇高地位。真正深入系统地从事思想内容、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对《红楼梦》进行全方位研究论证

的，当自周汝昌始。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连点成线，使得人们心目中的曹雪芹形象逐渐清晰。他还进一步提出：家世、版本、探佚、脂评这四方面的研究，才是“正宗”红学的范围，这些构成了周汝昌独特的红学体系，他为这个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奋斗了一生。为一部作品及作者耗费65年心血，在二百多年的红楼“寻梦”之旅中，唯此一人而已。只有周汝昌这样苦行僧式的“解味道人”，才能从天津咸水沽小镇走向全国，成为一代红学巨匠。

我感受更多的，是周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历尽坎坷却不消沉，一生尽瘁学术并为之执着进取。红学研究不是其一生成就的全部，他的书法也颇具特色，诗词赏析方面更是别有会心。他阅尽人生却并不世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来往的多是名流学者，也不乏“达官显贵”。我去北京红庙寓所造访，有时会遇到一些不寻常的客人。这种情况下，周先生不慌不忙，仍有条不紊地和我将该说的话说完，才去接待新一拨客人。于周先生而论，我不过是红学晚辈，但与其的交往有种平等感。他对任何人，表现出的都是不厚此薄彼的大家风度。他对红学晚辈的关心，业内有口皆碑。他曾特别为我研究生毕业之际的工作就业问题，给时任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夏康达教授写了推荐信，使我感受到长者的一份关切。

周汝昌先生虽然离开人间已经11年了，其身影渐行渐远，但对我而言，他似乎从未曾走远过。每当我人生处于低谷或逆境的时候，仰面瞥见书房里悬挂的周先生肖像及他给我的书法题词“薪传日朗，俊彦多贤。学积山崇，后来居上”，就油然而唤起我学术研究的热情与良知。于是沏上一杯清茶，埋头书案，度过那“煮字生涯墨磨人”的寂寞时刻。

题图摄影：高流心

都说“人人都爱苏东坡”，又说“苏东坡人见人爱”，不管是前者也好还是后者也好，苏东坡倒实实在在是居庙堂之高者和处江湖之远者大都心心念念的一位古代文人，而这大概是因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不同境遇里与他相逢”（纪录片《苏东坡》）吧。正是基于这种对苏东坡的喜爱和“相逢”，近世今时为苏东坡作文作传者不知凡几，如林语堂先生1947年所作的《苏东坡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认为苏东坡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且“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而这不只是林语堂先生一个人且也是众多作家书写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应是飞鸿：苏东坡的诗旅人生》（现代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新作。该书完全以古籍史料为本源，以苏东坡的诗词为脉络，以其仕途变换为节点，以其人际交往为线索，详尽书写苏东坡从出仕到逝世的整个仕宦历程，深刻分析其屡遭贬谪、频繁变迁但依然积极处理政事、豁达面对人生的根源，同时也展现了北宋中期的官场政治和社会风貌。作者梳理了苏东坡人生中的每段高峰与低谷的所有细节，重点勾勒了苏东坡在其间的思想变化和人生态度，并将地理、生活、思想三者相结合，清晰呈现了苏东坡的三种不同人生路径——官宦人生、流放人生、地理人生，彰显了苏东坡因地理、生活与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却又不变的一生。

苏东坡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人，除了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等，他面对仕途失意时的豁达人生态度更是被宋以降的人们所称道。

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和思想变迁是其诗词之外最受关注的，不管是青壮年时代的仕途顺遂，还是始于黄州的贬谪升迁频繁交替，抑或从惠州到儋州的一贬再贬，它们在苏东坡这里是一再变换的地方和官职，不变的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思想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以及面对仕途和人生双重不幸之后的一种绝望和无奈的不得不的豁达。其实，苏东坡的所有人生和他的思想都无疑在他的诗词里，也在他的性格里，不管是顺风顺水还是波折艰辛，不管才是名远播还是屡遭贬谪，可以说是他的文名和性格成就了他的所有幸与不幸。

苏东坡自24岁走上仕途开始，正适逢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改革，然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新旧党争，以致他的仕途走上了频繁贬谪升迁再贬谪之路，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极下去，而是尽可能地积极地做事且豁达地过生活。当然，苏东坡原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才是他人生的底色，寻求道家 and 佛家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已。实际上，苏轼的人生极大程度地受到其母程氏的影响，其在幼年时便以东汉名臣范滂的故事相勉励，苏轼对书画笔墨特别喜爱，似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领域，而母亲的教导成就了他的正直、有气节的以及求仁得仁的“当世之志”，也是形成其豁达人生底色的原因之一。随着苏东坡仕宦之路的不停变换以及高质量诗词佳作频出，他的交际圈上至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下至僧道田妇、村夫野老，从而使其在北宋中期文官治世的时代成就了一个无比深广且颇受关注的“朋友圈”——欧阳修、黄庭坚、张耒、曾巩、苏轼、苏辙、晁补之、王安石、司马光、王洙、李公麟、参寥、佛印等，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不管是朝臣友好还是村老歌妓。

苏东坡的人生起落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北宋政治史、文学史、地理史。纵观苏东坡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与官场格格不入、不肯放弃自我的落寞官员，但转眼看到的却是一个享誉朝野的文人大家的自适潇洒、人生彻悟，他在政治上、世俗生活里以及人生深处的所有“醒”和“不醒”都是或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如新旧党争、反对变法、疏浚河道、奏请度牒以及吟诗作文、谏言议事、友朋结交、市井生活等，而从中也看到了北宋文官集团虽互相倾轧但又惺惺相惜，以及不以政见不合而阻止良才能士人仕上升的基本法则。对于苏东坡而言，他的每一次仕途变换都成就了一段新的人生，每一个地方都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但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和自由不羁的性格却始终没有变过，而这也正是其“变化却又不变的一生”所在。正因为如此，苏东坡的每一段诗词就是一段人生，每一次变迁就是一次转折，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心境，每一种生活就是一种思想，不管是官宦人生、流放人生还是地理人生，都最终成就了苏东坡的豁达人生。

苏东坡的人生是复杂的，他的历程汇集了中国王朝史上所有文官官员的仕途路径，也凸显了王朝政治更迭的深层历史根源。为了更直接地表现苏东坡的人生历程，该书在每个篇章页里附录苏东坡仕途变换的示意图，直接道出章节内容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节点，而章名副题的诗词更是直接呈现苏东坡的内心思想变化，准确勾勒了苏东坡以地理、生活、思想相结合的三种不同人生路径。同时，文前附有与苏东坡及其人生高度相关的精美书画作品，如苏东坡的《宝月观茶帖》《治平帖》《黄州寒食帖》《归去来兮辞》《赤壁赋》等，以及宋仁宗、宋神宗、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宋哲宗、宋徽宗等王朝掌权者变换更迭对其人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以书画的形式简明、直白地将苏东坡的人生历程、历史功绩等清晰呈现，使得苏东坡的个人形象更加具体、生动且一目了然。

可以说，《应是飞鸿：苏东坡的诗旅人生》就是一部大文豪苏东坡的仕宦史、交际史、思想史。该书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关于苏东坡传记作品的地方在于，全书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每一个篇章又可以单独成篇保持其独立性，不仅对后人眼里的“弱宋”为何会出现如苏东坡这样彪炳千秋的文人，为何苏东坡的“不醒”只是面对世俗与官场而非面对人内心深处，以及为何苏东坡能与王安石一笑泯恩仇给出了答案，更作出了简单的“性格豁达”岂能完全对应苏东坡一生起落直接陈述。同时，该书在写作上既遵循相关的古籍史料而不拘泥于前人的写作，又贯穿苏东坡的诗词而避免了与当下他者雷同或囿于前人学说，富有史料性、社会性和文学性，兼有学术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双重特点。

应是飞鸿…… 苏东坡的诗旅人生

谢惠



喀纳斯湖雪峰耸峙绿波墨林，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被誉为“人间仙境”“神的花园”。与之迥异，风景沾了“怪”字的，乌鲁木齐那处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当之无愧得“魔鬼城”，而吉木乃这座奇山峭壁的花岗岩的石城，则又被称为了“神石城”。这里遍布造型独特的神石之外，还有着美丽的草原和花海，似乎本应为神仙居所。

这就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昭示了人们，每一个地方都自有独特之美，有时就看你欣赏的角度了。

吉木乃神石城之前鲜为众知，只因地处偏远，“养在深闺人未识”。也的确如此，同在北疆，两地虽相距330余公里，对于在克拉玛依的我来说，吉木乃曾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神石城距吉木乃县城40公里，在托斯特乡冬牧场内。前往神石城的那天，是其最美季节的7月间。和煦的阳光把缤纷的色彩倾泻在广袤的大地上。瓦蓝的天空上点缀了数朵白云，舒卷轻逸，给人一种不可言状的温馨。打开车窗，夏风拂面，安谧惬意。车子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越过一望无际的荒岭，一度盘旋绕行在被山体包围的山谷里。山路十八弯，山峦陡峭，绵延起伏，车子不时艰难地爬行，斗折蛇行。不觉越走越高，一时间仿佛伸手即可触及白云，使人有种腾云驾雾的飘逸感，又有以手拊膺的紧张感。

令人心绪舒缓下来的，是每一座山的背面，都铺满了一方山花烂漫的地毯。花草稀疏之处，路边闪现出几株草花，幽淡地开着朵朵素白的小花。相伴有开着黄花的铃铃刺，白黄两种极致色彩的渲染，让茫茫戈壁不再单调寂寥，瞬间焕发出别样的活力。

眼前豁然开朗。啊！满眼巨石，进入神石城了。

神石城牧场广袤，湛蓝明净的天空，皎洁飘逸的白云，满眼姹紫嫣红的野花。果然山无石不雄。特殊的地质背景和生态环境，使得草香清扬的山脊和山坡上由溶蚀和侵蚀作用形成的造型奇异的花岗岩地貌类型丰富、典型，怪石群体和单体自呈其形，连片状态更佳，规模宏大，形态传神，将这一方草原装点得美如仙境。

更为奇异的是，这些神石从不同角度赏阅，会随着昼夜晴雨的交替，晓霞暮靄的变幻而变化，是目前国内较理想的自然景观类沉积与构造系的典型地质，堪称花岗岩风蚀地貌的博物馆。花岗岩石蛋地貌、石蛋堆砌地貌、石臼、石穴、石洞、石盆、石林、石柱、石槽、崖壁等多种微地貌，类型齐全。这些大自然留下的艺术品，千姿百态，正静静等待着与每一位来客神会。

走进了神石城，一如走进了“动物海洋”。满山的“动物”奇石个个神形兼备，据说叫得出名字的就有50多个。随意变换视角，便会改变感觉，令人情感的游丝遐想无尽。我刚说这块巨石像大象，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小儿却像长颈鹿。有几处石堆，均似乌龟，区别只在大小和形态。前方有“一峰骆驼”，傲然屹立，与蓝天白云相拥；一块巨石像极了海豚，正在草原的万顷绿浪上嬉戏；一转身又见到了“一只狰狞的草原狮”，张牙舞爪正欲扑向羊群，令人心悸；而“这只神鸡”是那样精神，正引颈高歌，似在把大地唤醒，迎接新一缕晨阳的到来。真是一处“动物”群居的和谐胜境。

凝目观望，这里也是“人物的世界”。每块似人的“神石”都有不同的来历和传说，大自然早就赋予了其不同的性灵。突然一座座巨石堆吸引了我的注目，主体形状似人，其下大小不一、高高低低的群石，紧密相拥似围坐的孩子们，“一家人”亲密无间，似正在窃窃私语，也许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远处一石宛如壮士，手持利剑，峻拔挺立；又有一石形似罗汉，亦如历经世事的长者，与你近在咫尺神态自若地交谈；更奇的是石挺拔威严、宽额短须、双目炯炯，犹如边陲卫士，注视着前方，令人肃然起敬。

小刘租来了两匹马，我俩骑着骏马，时而在草原上奔驰，时而翻上一道山梁远眺，时而优哉游哉穿行在怪石阵中，挨个拜访，所经巨石昂然矗立，奇异姿态让人浮想联翩。赏石，最能考验浪漫之人的丰富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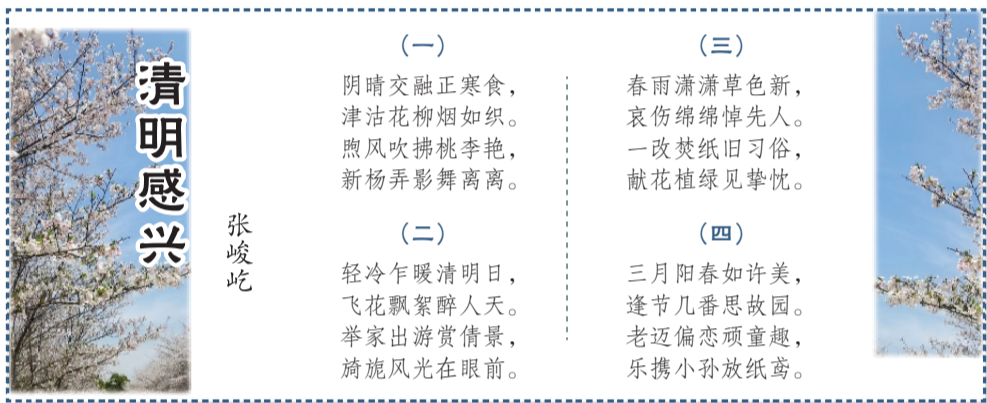
于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这里是通天洞，在此发现了新疆首个有明确年代的4.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存。听到了这一信息，我当即打消了去更高处的石臼寻找有着两亿多年历史、与恐龙同时代生活过的“仙女虾”的念头。我们专程登了通天洞遗址，这里出土了各类标本和动物化石2000余件，尤其是旧石器有重大发现。当然，我们在此只做了番历史的回望。

神石城还有一特别之处，在陡峭笔直的半山腰，有一汪从未干涸的清泉，当地牧民称之为“神泉”，据说长期饮用这清澈甘甜的泉水能够延年益寿，虽不是太大的诱惑，但我还是攀登上去物饮了一杯。

良好的生态环境，极其丰富的物种，使这里成为研究动物植物学的天然标本库和基因库。目前已知的珍稀中草药材就有上百种之多，时常可见草原旱獭、变色蜥蜴等野生小動物从草丛间掠过，而蔚蓝的天空上，有两只苍鹰展翅翱翔。

能够将人的神思拉回现实的，是草原上的牛羊，不少都悠闲地躺在了地上，一派原生态风味。

一阵山风迎面而来，丝丝清凉的感觉弥漫周身，炎炎夏日炙灼的心灵彻底舒展，直对着每一块巨石呐喊，以抒发心中了无涯涯的喜悦。而心中，同时又充满了对大自然深深的震撼和敬畏。



清明感兴
张峻屹

(一)
阴晴交融正寒食，
津沽花柳烟如织。
煦风吹拂桃李艳，
新杨弄影舞离离。

(二)
轻冷乍暖清明日，
飞花飘絮醉人天。
举家出游赏情景，
旖旎风光在眼前。

(三)
春雨潇潇草色新，
哀伤绵绵悼先人。
一改焚纸旧习俗，
献花植绿见拳忱。

(四)
三月阳春如许美，
逢节几番思故园。
老迈偏恋顽童趣，
乐携小孙放纸鸢。

在烙画馆里，听主人介绍烙画的历史，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原始人拿着烧火的棍子在刚刚杀死的一只猴子身上捅了一下，觉得像一个花纹。于是他就继续捅，继续捅，按自己的想象捅下去，猴子的身体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果实图形。这可能就是烙画的最早雏形。他的儿子孙子比他进步些，改用烧火棍在木头上更细腻地“捅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代代流传。这有点血腥和残酷，却可能更接近真实。介绍人把烙画的传说落在东汉刘秀身上，估计就像唱戏的人把李隆基奉为祖师，木匠说锯子是鲁班发明的一样，需要一个大人物为自己背书。

烙画（又称火笔画）注定了是个小众的东西，比较直接的解释是“用火烧热铁笔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我视之为“疼痛的画”，古人在罪犯额头和脸上刺字发配边疆，所谓“刺配”，疼；在胳膊上、后背上刺青，以明心迹，也疼。烙画只是换了作画工具，疼痛应没什么区别。

坐在烙画基地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我拿着烙笔，面对一块木板，尝试着作画。木板上有事先勾好的线条，所谓作画，其实就是描摹那些线条。烙笔是一根像圆珠笔一样的小铁棍，从一开始就要小心，别让它触碰到身体。

烙笔开始是凉的，通上电，慢慢变热，直至发烫。烙笔自身不产生热量，热量来自外力，电或者火，那些积累起来的热量让笔疼，再疼，更疼，足以将其毁灭，它必须把这些热量排解出去，哪怕面前是一块死硬的石头。

那块木板好像一直在等着它呢。自从树木被砍倒，晾干，削割，变成一块平整的木板，就知道这不会是最终结局，而是一个过程。但等待的时间越长，它内心越是不安，盼着另一个事物快点凑过来，哪怕是一支滚烫的烙笔。

烙笔落在木板上，木板能不疼吗？它忍着，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笨哈哈的人第一笔就使劲烙下去，木板吱吱响，一股烟儿霍然而起，有一股焦糊味儿。这其实是烙坏了。即使这个人内心里涌动着万千酸甜苦辣，手下也得轻重得宜，把握好烙笔的角度和压力，落、起、止、走、住、叠、圆、回、藏，笔笔有千秋。一笔下去，有的深，有的浅，如果修改，就只能更深，不可能变浅；只能增加，不可能擦掉重来。只能更疼，而不是不疼。

世间万物，都会本能地拒绝疼痛，但疼痛又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爱恨情仇，都是疼痛之一。不疼为麻木，小疼为痒，大疼为苦。在从小疼到大疼的过渡中，有一个巨大的空间。烙画高手的笔下，从浅到深，会有几十种直至上百种层次出来，恰如人类“疼痛”的千百种感觉。我只是描摹一个勾画好的图形，只要我爱它，认真对待它，也需把这些情绪都品味一个遍。

我看到过好多烙画作品，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几乎没有世俗表达中称之为“欢快”的色调。这从其颜色一眼可见。烙画以黑、棕、茶、黄、白五色为主要色调，没有粉，没有蓝（即便有，也是特意涂上的颜料，非其本心），不鲜艳。“黄”似可划入鲜艳一类，而烙画的“黄”，略似土黄，亦不堪道。但它们整体看上去是那么沉稳；画山，那山站得住；画鸟，那鸟轻易不飞走；画云彩，那云彩飘而不浮。它们和木板紧紧贴在一起，成了一个凝固的“疼痛”。

好多人在这里描摹，作画。晾干、打磨之后的作品，无论朴拙、流畅，似乎都在草木间度过了春夏秋冬，经历了三生三世。它们那么淡定，那么干净，让你在盯住它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成了画上的某一根线条，任谁也沾不走。

疼痛的画

王国华



台湾玄奘寺与天津独乐寺

张威



据文献记载，位于蓟州区定武街的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重建于契丹统和二年（公元984年），距今已逾千年，是天津境内现存最古老的两座木结构古建筑。观音阁更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建筑。观音阁外观两层，因为有一个平坐暗层，实为三层。阁内中空，以容纳十一面观音塑像。

1932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对独乐寺进行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的第一次科学考察。梁先生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成为中国建筑史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然而，大多中国建筑史学者与天津市民不知道

的是，在宝岛台湾竟然有一座与独乐寺观音阁相似的建筑，它就是位于日月潭潭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的玄奘寺正殿。

玄奘寺虽然始建于1965年，但其却大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京掠走玄奘大师的灵骨，供奉在日本慈恩寺。1955年，经交涉，中国台湾方面迎回灵骨。起初供奉于日月潭畔之玄光寺。1965年11月，玄奘寺建成后，灵骨迁入座落玄奘寺。

据玄奘寺的导游词介绍，其正殿为一座仿唐式建筑，共有三层。一层采用中西合一的方式，门楣上有“玄奘殿”三个大字。二层是供奉玄奘法师佛位的主殿。三层供奉玄奘法师的舍利子和玄奘宝塔，也是玄奘寺的经典文库重地。

设计玄奘寺的建筑师是被誉为“建造大半个南京”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卢毓骏（1904—1975），卢氏后来还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建筑与都市设计系。台湾建筑历史学者李乾朗认为，玄奘寺是卢毓骏一生当中唯一的模仿之作。卢氏的设计动机可能为彰显玄奘之崇高历史地

位，而因循独乐寺观音阁之形式，以钢筋混凝土复建一座辽代楼阁。

与独乐寺观音阁不同的是，玄奘寺主殿虽也有三层，但殿内不设空筒，与普通的三层楼阁建筑无异。外观上，卢毓骏对独乐寺观音阁做了“复原设计”。去除了清代乾隆时期在观音阁四角添加的八根擎檐柱，并将清代改变过的瓦顶纹饰按山门的形式复原为鸱尾。从色彩上，玄奘寺主殿与观音阁差距颇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墙面由观音阁的土红色变为白色；二，观音阁屋顶的灰色瓦片变为黄色琉璃瓦；三，玄奘寺主殿的彩画为重新设计。

台湾玄奘寺主殿的设计可以视为深受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先生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玄奘寺主殿与天津独乐寺观音阁在建筑方面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